

外国非虚构文学丛书

巴巴拉女皇



加洛

主编

BA LA
HUANG

巴 巴 拉 女 皇

陈加洛 主编
张英进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福州

巴巴拉女皇

“外国非虚构文学丛书”之一

陈加洛 张英进 主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2印张 2插页 24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710

ISBN 7-80534-051-X/I·50

书号：10368·312 定价：2.45元

前　　言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蕴酿、选材、翻译、校正和编辑，《外国非虚构文学丛书》第一集终于与中国广大的读者见面。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一种尝试，更是一种奉献：尝试着从欧美当代浩如烟海的非虚构文学中挑选出能够反映现实、反映人生、反映历史的文章，以奉献给至今对这类文学体裁尚觉陌生的中国读者。这套丛书的问世是中外学者与出版界交流的成果，其间饱含着国内外同行的期望、翻译工作者的努力以及出版社编辑的辛劳。如今，丛书上市，笔者殷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非虚构文学在西方的兴起恰是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这里含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二十多年来，这崛起的非虚构文学已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之中，其自身在题材的广度、主题的深度和风格的多样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概括地说，六十年代的作品切合时事，及时反映当时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和人生观念的剧烈变迁。《永不归来的间谍》（亨利·赫特著）、《一位宇航员的祈祷》（汤姆·沃尔夫著）和

《白色的唱片》(琼·迪迪恩著)等很能代表这个时期的作品特色。随着社会环境和人生经历的复杂化，非虚构文学作品逐渐深入探索当代的“神化”——人们天天目睹着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件究竟是“现实”还是“虚构”？看看美国学术界研究非虚构文学专著的标题，我们不难觉察出作家和评论家的追求：《事实和虚构：新新闻体和非虚构小说》(约翰·霍尔威尔著)，《事实的寓言：作为新小说的新新闻体》(约翰·海尔曼著)和《神话史诗般的现实：美国二战后的非虚构小说》(马舒·札瓦拉札德著)。由于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影响日趋扩大，美国不少大学陆续开设了“非虚构文学课”，引导学生思考这种文学体裁与美国、欧洲文化的相互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们不仅研究欧美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近年来日益繁荣的中国非虚构文学创作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张辛欣的《北京人》译成英文即将出版即是一例)。这套《外国非虚构文学丛书》的出版，笔者相信，一定会促进和提高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为绚丽多彩的文艺百花园多增一分姿色。

笔者除了衷心感谢《序言》中提及的中外学者与各界同仁，在此特意向美国密执根州的新闻教授詹姆斯·布莱德肖及夫人、向伊利诺斯州的唐纳德·怀特先生及夫人致以谢意，他(她)们对本丛书的主题与题材的选择提出了极为宝贵的建议。笔者尤其感谢美国爱荷华大学英文教授、小说家和剧作家威廉·默里先生，他二十多年来致力美国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教学的丰富经验和满腔热情对本丛书的编辑、出

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笔者感谢爱荷华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吉姆·斯塔特和研究生埃德·达纳，感谢他们为丛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感谢海峡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尤其是责任编辑苏静波对本丛书自始至终的热心关照。

陈加洛 张英进

一九八七年六月

于厦门大学

脱颖而出的艺术品：外国非虚构文学（代序）

非虚构文学是当代欧美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其销售量在外国书籍市场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对广大的中国读者来说，“非虚构文学”这个名称不仅显得陌生，而且还有点儿自相矛盾。文学本来似乎应该是虚构的；既然非虚构，又如何称之为文学呢？这种疑虑正是欧美读者二十年前对脱颖而出的这一新的文学形式的普遍反应。

1966年，蜚声欧美文坛的美国作家特普门·卡波蒂在沉默了几年之后，突然抛出了他坚持称之为“非虚构小说”的《血案》一书。这本书以严肃的笔触描述了发生在堪萨斯州的一桩凶杀案，一跃而成雅俗共赏的畅销书。《血案》并非新闻报道，卡波蒂也不屑以新闻记者自居；相反，他宣称他发明了新的文学形式——“非虚构小说”。非虚构当然指描写真人真事，而其成为小说，却意味着在传统的新闻报道领域里引进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作品赋有引人入胜的新的魅力。从此，非虚构文学作品在遭受多年的白眼和揶揄之后，终于得到了正名。一种酝酿多年的新的艺术形式脱颖而出，发出奇异的艺术芳香。

在介绍、引进非虚构文学这一种在外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新形式之际。回顾它的发展过程，对比它与小说在形成阶段的相似情境，进而分析它如何获取了小说所特有的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这对我国的读者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一般读者的眼中，记者生涯只是作家生涯的准备阶段，甚至记者们也不否认这种观点。你要成为作家吗？那么请你先到报社当几年记者，接触现实、接触人生，积累第一手的生活素材，然后闭门造车，伏案疾书，写出一本轰动文坛的畅销书。确实，纵观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坛，你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作家兼记者的海明威、斯坦贝克先后获取了文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都很坎坷，当过战地记者，砖瓦运输工等等。谁能想象著名的福克纳先生也曾在纽约的一家希腊餐馆中洗过碟子？但是，我们不必言过其实。三十年代这种作家和记者的血缘关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渐渐疏远了。高贵的小说家们跻身象牙之塔，钻入潜意识的底层，醉心于探索思维的边际地带，沉湎于典雅的“神话”与“寓言”式的启示录小说之中。他们或者不屑于顾及残酷的现实，或者没勇气描绘现实的残酷。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与记者似乎有一种职业分工的默契。

六十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社会。一方面，越南战争、太空探险、政治谋杀等重大事件改变了大众对传统人生信念的怀疑；另一方面，对传统人生信念的怀疑或反抗导致了道德风貌、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的巨大改变，这些改变生动地反映在一些不太雅观的名称之中，诸如

“代沟”、“反文化”、“性解放”和“上帝死亡”等等。六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即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残酷的现实触目惊心。记者们指望小说家会直面现实，出版商们也期待小说家们创作出反映这些现实的优秀作品，但是，他们都失望了。他们见到的只是“异化王子”，远航到孤岛上，背向着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于是，揭露现实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新闻记者的身上，这是非虚构文学发展的良好机会。

六十年代美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记者作家们掌握现实主义创作技巧的过程。他们在传统的人物特写和消息报道中应用小说技巧，使非虚构文学具有现实主义的魅力，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掌握和应用是本能的、直觉的，具体表现在作品的“直接性”、“现实细节”、“感情介入”、以及“引人入胜”的特征之中。技巧的发现使记者作家们产生一种创新感，敦促他们继续进行有益的探索。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难免遭受传统势力的非议。新人文主义、新诗、新批评派是这样，新新闻体（作为非虚构作品的另一名称）也是这样。在传统的客观环境的描写中加入新奇的主观感受的表达，这种新的文体遂即被戴上“印象主义”的“混血儿”的雅号。传统的新闻派指责这种新闻变体，而苛刻的文学批评家拒绝接纳非虚构文学进入艺术殿堂。1965年，《纽约书评》点名批评了勇于探索的《绅士》杂志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周末副刊《纽约》。但是，指责归指责，探索仍在进行，而且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时至1966年6月，以高雅著称的《大西洋》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正式

承认非虚构文学是严肃的艺术形式。

决定文学发展的毕竟不是少数高高在上的文人，而是广大的读者群众。有趣的是，非虚构文学的发展不仅引起了小说家的关注，而且还挽救了一部分作家的名声。前面提到的卡波蒂是一例，《血案》最先在《纽约人》杂志上连载，轰动了读者，使一度销声匿迹的卡波蒂重新驰名文坛。另一个例子是诺曼·梅勃，他于1968年发表的《夜里的军队》，虽然不如《血案》畅销，却也在文学界里重新确定了他的作家地位。著名作家转向非虚构文学的创作，这在八十年代的欧美早已蔚然成风，其中的历史启示至今令人深思。

要更深刻地认识上述历史启示，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非虚构文学与小说在形成阶段所遭遇的相似情境。

特鲁门·卡波蒂在1966年出版《血案》一书时称之为“非虚构小说”，他的用意是让作品带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形式（小说）的光轮。与此成历史“巧合”的是英国作家菲尔丁，他在1742年出版小说《约瑟夫·安德鲁传》时，即称其为“用散文写的滑稽史诗”，因为诗乃是当时公认的文学形式。即便如此谦卑，在十八世纪欧洲小说的崛起时期中，不乏有传统文人对小说家和小说横加指责。大名鼎鼎的约翰生博士因为菲尔丁的小说描写“下等人”而将其拒之门外。同样，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非虚构文学也被斥为“准新闻体”，专门描写“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不错，非虚构文学作品同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小说一样，是描写了非英雄、非贵族的“下等公民”：政府小官吏、越战中的士兵、黑手党分子、杀人犯、拉皮条的、娼妓、地下影星、嬉皮

士，吸毒犯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并不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的耻辱；相反，这应该是一种光荣：在小说家龟缩在象牙塔之中，不愿接受他们的先驱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引以为荣的“社会编年史家”的重任之时，是记者作家们站出来承担了这个历史职责。

再说，非虚构作品也不仅仅囿于“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圈子中，它们的笔触也指向风云世界的人物（美国总统、英国皇族、金融巨头、影视红星、体坛名将）和震动星球的事件（登月旅行、太空探险）。严格说来，非虚构文学的题材范围是广泛的，不受高雅尺度的限制。

为什么非虚构文学在发轫时期会受到责难？为什么它的先驱们要借小说的光环来美化它？这恐怕和传统的偏见有关。在世人的眼中，文学工作者仿佛有三个等级：处于最高地位的自然是令人羡慕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代表了文学的精华；其次居中的是文人，批评家、传记作家和文学史学家，他们的好恶似乎决定了作家的兴亡；最低一层的是新闻记者，他们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只能屈居于低贱的“报道”工作中。或许基于这种偏见，非虚构作品一向不得涉入文学天地，倘有幸涉足，也仅仅作为文学作品的“陪衬”。但是，六十年代以来外国非虚构文学的兴起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偏见。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的作品尽管“高雅”，毕竟是“曲高和寡”，影响力不强。相反，非虚构文学作品以小说技巧反映现实人生，以其独特的“直接性”和“亲切感”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大众。历史是无情的，传统的等级框架在现实面前正渐渐崩溃。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受传者（读者）的反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仅仅持不屑一顾的傲然态度无视非虚构文学的崛起是无济于事的。文学中的沙文主义应该取消；应该以更宽容的态度对待读者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包括非虚构文学。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非虚构文学作为读者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新闻体并不新，不少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早就尝试过类似体裁（当然是偶尔为之，并不妨碍他们的小说创作）。马克·吐温发表过两部非虚构作品，一是自传性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另一部是以幽默的笔调描述欧洲风土人情的游记《无知者在国外》。美国的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也不例外，他曾用笔名发表了《伯兹的速写》，描绘十九世纪的伦敦市民生活。到了二十世纪，非虚构文学作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约翰·里德的名作《震撼世界的十天》即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值得指出，在美国，非虚构文学已成为近五十年来美国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许多作家在尝试其它文学形式后纷纷采用这种新的、似乎更有魅力的艺术体裁。

非虚构作品之所以又称新新闻体，主要因为它采用小说的艺术技巧表达作家对真人真事的深刻感受。感受要深刻，则往往需要亲历其境。为此，作家记者们常常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描写对象，感受周围环境，挖掘事件的内蕴。卡波蒂为了创作《血案》，用五年的时间研究案情，采访囚入监狱的凶手。约翰·塞克说服陆军让他参加部队的训练，

最后亲身经历枪林弹雨，方才写出《M》一书。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正因为有了这些亲身感受，非虚构作品才显得更接近人生，更富有人情，它的引人入胜的描述才可能令人耳目一新。

要做到引人入胜，要达到艺术的境界，没有对写作技巧的重视是不可能的。在非虚构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记者作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段，甚至包括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手法，以求丰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表现力。美国非虚构文学的创始人汤姆·伍尔夫在总结六十年代非虚构文学的发展经验时，着重强调了四种基本的技巧。

第一种技巧是重视一幕幕的场景，让故事自然地过渡发展，而不需要作者本人一再旁白。场景的重现使作家能够置身故事的发展之中，让人物自己表现自己。而最能够表现人物自己的，不是记者妄加的评论，而是人物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由此而来的是第二种技巧：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人物的言谈。记录言谈是记者的职业本领，通过再现这些言谈，人物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给读者以既真实又亲切的感觉。

第三种技巧是所谓的“第三人称视角”，通过某一人物的眼睛叙述故事，使读者产生置身于人物的心灵之中的感觉，亲自感受人物所感受的一切。传统的新闻报道习惯采用自传作者和传记作家一再使用的“第一人称视角”——“我在哪儿见到……”，这种语调给人一种距离感，甚至一种说教感，因此局限很大。

第四种技巧最不为人们理解，即如实记录姿势、习惯、

风度、风俗、家具式样、服装款式以及各种各样的表情、眼神、说话口气和走路姿态等微小的细节，这些细节在特定场景中可以具有象征的意义。记录这些细节并不是文章的点缀，而是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的关键。

及时地总结写作经验，分析写作技巧，这对发展非虚构文学非常有益。外国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外国非虚构文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终于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形式，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美国，每个月都有畅销书一览表，其中赫然醒目地标上两栏：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而实际上非虚构作品的畅销量往往超过虚构作品。

非虚构作品是一种活泼的文学形式，风格多样，体裁不拘，题材广泛。风格有的轻松、有的深沉、有的严峻、有的幽默。体裁有短小精悍的人物特写，有内容丰富的人物传记，有溯根求源的事件报道，有色彩斑斓的场景描绘，还有情趣盎然的游记小品。题材的涉及面之广更是小说所未能企及：青年题材、文艺题材、政治题材、战争题材、体育题材、家庭题材、经济题材、犯罪题材，等等。可以说，外国非虚构文学真实地记录了当代外国社会的万千气象，是了解国外现实社会的理想途径。

为了更好地反映当代外国的社会现实，打开中国读者的视野，促进我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我们荟萃当代外国非虚构文学的精品，编成丛书，奉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和有志于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记者。

介绍和引进旨在借鉴和提高。同国外的情况一样，我国的非虚构作品也很受读者欢迎。继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报告文学一度风靡全国，至今方兴未艾。近年来，许多知名的小说家转向非虚构文学创作，他们放弃报告文学这一名称，采用诸如“纪实小说”之类的新名词，其用意不完全是为了标新立异。我们相信，认识外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这对我国文学界的新的探索将起着有益的推进作用。

在《外国非虚构文学丛书》的选编工作中，我们得到了海内外文学、教育与新闻出版界的同仁们的热情鼓励。我们感谢美国斯坦福大学原新闻传播系主任纳尔逊教授与夫人对选编目标的赞赏；感谢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余也鲁教授和张同先生亲自为本丛书提供资料。我们感谢厦门大学将本丛书的选编列为报送国家教委的“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在众多同仁的支持下，我们相信《外国非虚构文学丛书》将受到中国读书界的欢迎，达到预期的选编目的。

张英进

1987年6月于美国衣阿华大学

《外国非虚构文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陈加洛 张英进

编委：王洛林 陈加洛 张英进 张健行 苏静波
卓钟霖 林秀平

(以上按姓氏笔划为序)

目 录

前言	(1)
序	(1)
一分钟总统竞选演说	(1)
巴拉女皇	(19)
一位宇航员的祈祷	(33)
别开生面的大学教授法	(69)
马勒先生：十八个孩子的父亲	(82)
母子情九年如一日	(100)
贝思·安与禅宗摄生法	(122)
日暮里的黄金之乡	(135)
柔中寓刚	(156)
女歌手的三个戏剧高潮	(181)
永不归来的间谍	(195)
侦探巴雷特	(237)